

# 自由主義與「反帝」 意識的內在緊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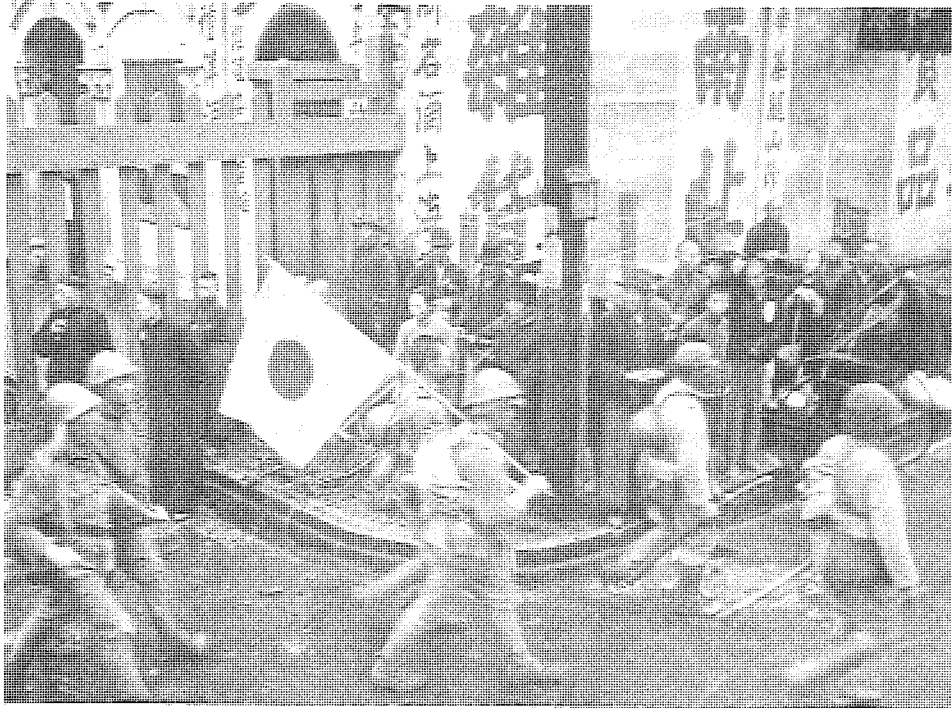
◎ 章 清

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對現代中國思想、文化、政治有多方影響的自覺理論，是與激進主義、保守主義相伴而生的。在中國這個小農經濟及其意識佔支配地位的國度中，自由主義者若想堅持啟蒙的目標，所碰到的困難更遠遠超出西方的先行者。西方啟蒙學者並不用擔心諸如「非英國化」、「非法國化」或是「非德國化」之類的指責<sup>①</sup>，而中國自由主義者承擔的最大罪名即是「非中國化」。尤有甚者，無論是以反帝為號召的激進主義者還是以宏揚傳統價值觀念為職志的保守主義者，都不約而同地把自由主義置於與民族主義軒輊對立的境地：以其為帝國主義代言人和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的代表。

中國自由主義者承擔的最大罪名即是「非中國化」，無論是以反帝為號召的激進主義者還是保守主義者，都不約而同地把自由主義置於與民族主義軒輊對立的境地：以其為帝國主義代言人和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的代表。

自由主義者雖然主要是藉着導源於西方的原則來衡量傳統的資源，但他們本身也證明着民族主義是現代中國共同的情感。檢討自由主義者彰顯自由價值與反思傳統文化的立場與用意，很容易就能發現似乎與民族主義格格不入的政治信念、文化取向，其實都是在民族主義情感驅使下進行的。只是在拒絕接受任何形式的排外主義方向，才顯示出自由主義與熾熱的民族主義的區別。自由主義者更多地把中國擺脫困境的希望寄托於中國自身的努力與誠懇向西方學習。

除了強調對民族國家的高度投入和依靠民族過去的榮光重建民族自豪感，與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想俱來的還有兩種基本的涵義：一是因憤恨中國少數滿族統治產生的「種族的民族主義」；另一種則是作為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反應而出現的「反帝的民族主義」。於是以滿族的統治和列強的入侵解釋自近代以來所遭遇的挫折與屈辱，也相應構成了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想主導的價值取向和思想觀念。而正是在這兩種涵義上，方才真正顯示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民族主義者的區別，自由主義者確信，中國的困境是無法用民族主義這兩種涵義中的任何一種能夠解釋的。



中國知識分子把日本視作弱小國家走向成功的例證，也作為中國現代化希望之所在，但中國卻不斷遭受日本的侵略。圖為1937年12月日本軍佔領杭州。

## 嚴復的「診斷」

嚴復作為現代中國從自由主義立場診斷中國問題的第一人，從一開始就與提倡「反滿革命」與義和團式的拒外心態有明顯的差別。在〈擬上皇帝書〉文中，談及中國的病情是否應由「帝國主義」負主要責任，他就作了否定的回答：「今夫外患之乘中國，古有之矣。然彼皆利中國之弱且亂，而後可以得志。而今之各國，大約而言之，其用心初不若此。是故徒以外患而論，則今之為治，尚易於古叔季之時。夫易為而不能為，則其故由於內治之不修，積重而難返：故外患雖亟，尚非吾國病本之所在也。臣故曰：『今日之積弱，由於外患者十之三，由於內患者十之七。』」<sup>②</sup>肯定中國的困境主要的來自「內弊」的積重難返。

以此也可以預料到的，當義和團在現代中國演出最激烈的排外的一幕，嚴復完全置身於義和團的狂熱之外，雖然義和團精神確實感染了他，並肯定「其中不可謂無愛國者」，但嚴復更強調的是，義和團排外乃「妖民愚豎，盜兵潢池，其貽禍國家至矣。……特愚妄憤戾，而其術又純出於野蠻，此其所以終被惡名，而無以自解於天下。」<sup>③</sup>

嚴復之不接受以帝國主義為中國的禍源，根本緣由還是他所熱誠接受的人類由低向高發展的進化觀點。他要人們相信，始於圖騰，繼以宗法，而成於國家的西方歷史進化的次序代表了人類常規的進化道路，「若天之四時，若人身之童少壯老」，當然他也困惑不已，何以中國社會不能適應生存競爭？迄今為止仍是「宗法居其七，而軍國居其三」<sup>④</sup>。但由於這條常規道路不僅為他所尊敬的西方宗師所證明，而且還指明了中國可能通向一個光明的目標，因此嚴復不能同意那種認為要不是西方列強的干涉，中國早已通過歷史進化的正常階段的觀點。可以說，依據這樣的進化觀點，嚴復對中國困境的解釋只能把着眼點牢

自由主義者確信，中國的困境是無法用民族主義涵義能夠解釋的。

嚴復認為，西方帝國主義的擴張性是生存競爭導致的正常結果，中國連遭挫折，只能由其本身的衰敗和虛弱承擔主要的責任。

牢繫在中國本身，亦即是說，雖然嚴復同樣哀嘆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無孔不入，但他只能痛苦地認為，西方帝國主義的擴張性是生存競爭導致的正常結果，中國在這一競爭過程中接連遭受挫折，只能由其本身的衰敗和虛弱承擔主要的責任。

由此出發，嚴復也將中國的希望寄托在滿清王朝的現代化的努力上，並認定期時喧囂塵上的排滿的民族革命是站不住腳的。在《社會通詮》裏嚴復所加一則按語即說：「中國社會，宗法而兼軍國者也。故其言法也，亦以種不以國，觀滿人得國幾三百年，而滿漢種界，厘然猶在。……是以今日黨派，雖有新舊之殊，至於民族主義，則不謀而皆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滿。至於言軍國主義，期人人自立者，則幾無人焉。蓋民族主義，乃吾人種智之所固有者，而無待於外鑠，特遇事而顯耳。雖然，民族主義遂將足以強吾種乎？愚有以決其不能者矣。」<sup>⑤</sup>

## 胡適的「反調」

繼嚴復之後，胡適是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最具影響力最雄辯的代言人，相較之下，胡適愈加拒不接受以「帝國主義」解釋中國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清王朝的覆滅，民族主義的內容更加集中於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自由主義者反其道而行之，實際上促成了它與其他政治集團愈加對立起來。

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是伴隨五四以後瀰漫中國大地上熾熱的民族主義發展壯大的。在1923-1927年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革命的意識形態就接受了列寧關於殖民地國家應首先進行「反對中世紀殘餘」、「推翻外國統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思想，除了舉出反封建的旗幟，反對帝國主義更是二者合作的基礎。它們都把中國的不幸與苦難歸罪於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西方入侵，響亮地表達了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願望。

胡適與這種對中國現狀的分析表現出嚴重的分歧。1922年10月胡適所寫〈國際的中國〉一文就針對幾個月前〈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表達了不同的看法，中國共產黨指出「帝國主義的侵略與軍閥的擾亂」是中國內憂外患的源泉，胡適卻這樣看，他寫道：「我們要知道：外國投資者的希望中國和平與統一，實在不下於中國人民的希望和平與統一。自從辛亥革命以來，世界列強對中國的態度已有一種很明顯的變遷了。」胡適要人們相信，現在中國已沒有很大的國際侵略的危險了，盡可以不必去做懼怕國際侵略的噩夢，相反國際資本主義卻擔憂中國社會的不和平、無治安、不能保障投資者的利益與安全。因此他也樂觀地表示，如果說十年前列強希望征服統治中國，那麼現在只是希望讓中國盡早成為和平與統一的國家，這樣中國「最要緊的是同心協力的把自己的國家弄上政治的軌道上去。國家的政治上軌道，工商業可以自由發展了，投資者的正當利益有了保障了，國家的投資便不發生問題了，資本帝國主義者也就不能不在軌道上進行了」<sup>⑥</sup>。

30年代前後，胡適在這一點上又同當政的國民黨唱起了反調，不僅國民黨

在意識形態上對五四的背叛觸怒了他，而且國民黨毫無例外地把中國問題歸罪於帝國主義的影響也冒犯了他。更使胡適不能容忍的，是國民黨的宣傳家經常性地暗示了他和他的朋友們奮鬥經年的新文化運動是與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聯繫在一起的。所以胡適尖銳地批評說：「現在中國全部瀰漫着一股誇大狂的空氣：義和團都成了應該崇拜的英雄志士，而西洋文明只須『帝國主義』四個字便可輕輕抹殺！政府下令提倡舊禮教，而新少年高呼『打倒文化侵略！』」作為回答這類問題最淺顯的證據，胡適列舉了日本的情況：「不要盡說是帝國主義者害了我們。那是我們自己欺騙自己的話！我們要睜眼睛看看日本近六十年的歷史，試想想何以帝國主義的侵略壓不住日本的發憤自強？何以不平等條約捆不住日本的自由發展？何以我們跌倒了便爬不起來呢？」<sup>⑦</sup>

在寫於1929年的〈我們走那條路？〉那篇代表衆多人集體智慧的自由主義宣言式的綱領文獻中，胡適更加充分地論述到這個問題。他把中國問題的癥結歸為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仇敵，既抹殺了「資本主義」、「封建主義」，還聲稱帝國主義也不在打倒的範圍。胡適這樣辯解說：「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帝國主義為甚麼不能侵害美國和日本？為甚麼偏愛光顧我們的國家？豈不是因為我們受了這五大惡魔的毀害，遂沒有抵抗的能力了麼？故即為抵抗帝國主義起見，也應該先鏟除這五大仇敵。」<sup>⑧</sup>當梁漱溟對此提出詰難，胡適在答辯中則進一步以鴉片為例說明：「鴉片固是從外國進來，然吸鴉片者究竟是甚麼人？何以世界的有長進的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獨鍾於我神州民族？而今日滿回藩地的罌粟，難道都是外國的帝國主義者強迫我們種

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把中國的不幸與苦難歸罪於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西方入侵，響亮地表達了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願望。胡適與這種對中國現狀的分析表現出嚴重的分歧。



作為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最雄辯的代言人，胡適拒不接受以「帝國主義」解釋中國的困境，因而在「反帝」意識激盪的現代中國，處處碰壁。

下的嗎？」又繼續以日本為例說：「帝國主義者三叩日本之關門，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躍而為世界三大強國之一，何以我堂堂神州民族便一蹶不振如此？此中『癥結』究竟在甚麼地方？豈是把全副責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便了了事？」<sup>⑨</sup>

## 內在的「緊張」

就拒絕以帝國主義解釋中國的困境來說，無疑顯示了自由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熾烈的民族主義者在感情與理智上是何其的遙遠。嚴復痛陳中國的衰敗肇始於它不能適應生存競爭的環境，也必然要由自己來忍受種種奇恥大辱！胡適也告誡同胞一個國家的強弱盛衰都不能逃脫因果律，今日的痛苦與恥辱，都只是過去種種惡因帶來。而要進行自我拯救，他們又相信是極為緩慢的過程，以反帝為主旨不僅沒有可能，也是無濟於事的。我們知道，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差不多都成長於西方社會，在價值上無疑視西方為主要的力量源泉；受英美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對民族主義的流弊也是相當敏感的。而他們在現代中國啟蒙運動中奉獻的主要精神財富，就是論證了唯有思想啟蒙深入人心才能克服中國的一切弊端。更具體地說，他們堅定不移地把西方作為中國學習的楷模，相信只有廣泛地吸取世界文明已取得的成就——尤其是西方近代文明，中國才能擺脫使之衰敗和虛弱的種種無知。因此他們也否定了任何種類的排外主義。

拒絕以帝國主義解釋中國的困境顯示了自由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民族主義者在感情與理智上是何其的遙遠。他們在現代中國啟蒙運動中奉獻的主要精神財富，就是論證了唯有思想啟蒙深入人心才能克服中國的一切弊端。

然而，必須強調的是，儘管自由主義者對國際公則與人類理性虔誠信奉，也傾向於把中國擺脫困境的希望寄托在民族的自救上，但並不意味着他們對帝國主義在中國造成的實際影響熟視無睹，更談不上作為帝國主義的代言人毫無原則地為帝國主義辯護。實際上自由主義者為此感到的困惑並不遜於那些民族主義者，只是他們更多地認為奢言排外只能浪費極為有限的時間與精力，也傾向於通過民族的自救以實現國家富強、民族獨立的目標。嚴復在1902年所寫〈與《外交報》主人書〉中，通過列舉處理與外國的關係成功與失敗的實例，就集中談到了這一構想：「吾故曰：期於文明可，期於排外不可。期於文明，則不排外而自排；期於排外，將外不可排，而反自塞文明之路。」<sup>⑩</sup>當1925年的「五卅運動」使民族主義的激情達到白熱化的程度，胡適也撰文告誡人們說：「救國事業更非短時間所能解決：帝國主義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強盜』也不是幾千萬人的喊聲咒得死的。」並重申一個國家的拯救須始於自我的拯救，「救國須從救出你自己下手！」<sup>⑪</sup>

而且，即便是自由主義這種似乎不容於民族主義者卻實際又有識見的對「帝國主義」的分析，也是有限度的。說到底，自由主義者都始終不渝地忠於自己的國家，當逸出了民族國家存亡的限度，自由主義者都毫不猶豫地拋棄冷靜的理性，向民族主義認同。嚴復與胡適作為中國自由主義兩代人中最傑出的代表，在他們活躍的年代，中國都遭遇了來自鄰國日本的侵略。儘管日本在他們的構想中是弱小國家走向成功的例證，甚至作為中國現代化希望之所在，但他

們都義無反顧地站在反侵略的行列。中日甲午戰爭後期，當清政府決定簽約求和，嚴復就發表〈原強續篇〉，強烈要求與日作戰到底。他說：「僕生平固最不喜言戰者也，每謂有國者，雖席極可戰之勢，據極可戰之理，苟可以和，切勿妄動。迨不得已戰矣，則計無復之。唯有與戰相終始，萬萬不可求和，蓋和則終亡，而戰可期漸振。」又說：「此時不獨宜絕求和之心，且當去求助各國之志。何則？欲求人助者，必先自助。使我自坐廢，則人雖助我，亦必不力，而我之所失多矣。」<sup>⑫</sup>而胡適在戰爭的威脅面前，除了借此要求在軍事、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作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計劃，號召人們確立那種為「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志願，並堅持民主政治是在任何情況下不能讓渡的目標，從而贏得作為自由主義思想的代言人最高聲望。他本人也放棄了不談政治、不干政治的承諾，為拯救中國奔走呼號，且在四年駐美大使的任上獲得了「屬於最有見識的中國民族主義者」的讚譽<sup>⑬</sup>。

因此，自由主義與反帝意識這種詭譎歧異的發展，應當促使我們對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某種傾向更深刻地把握：民族主義觀念對於促進民族國家朝向現代化的目標，尤其是抵禦外族的入侵，無疑起到有效作用，但它演化為激烈的情緒並幾乎無往而不勝，尤其是左右到其他思想的發展，其意義是不適宜過分誇大的。自由主義並非毫無弱點，但從自由主義與反帝意識內在緊張的關係中，我們不能不得出一個令人沮喪的結論：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命運與其思想的純正性幾乎毫無關係，即使中國自由主義清楚地把握到個人價值的真正意義，真正掌握理性批判的武器，也不能改變自由主義者艱苦寂寞的多乖命運，甚至處境會更加艱難。

自由主義者都始終不渝地忠於自己的國家，當逸出了民族國家存亡的限度，自由主義者都毫不猶豫地拋棄冷靜的理性，向民族主義認同。

### 註釋

- ① 微拉·施瓦支：《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頁5。
- ② 嚴復：〈擬上皇帝書〉，《嚴復集》（一）（中華書局，1986），頁63。
- ③ 嚴復：〈主客評議〉，《嚴復集》（一），頁119。
- ④⑤ 嚴復：〈社會通詮·按語〉，《嚴復集》（四），頁923；頁925-26。
- ⑥ 胡適：〈國際的中國〉，《胡適文存》第二集，卷三。
- ⑦ 胡適：〈請大家來照照鏡子〉，《胡適文存》第三集，卷一。
- ⑧ 胡適：〈我們走那條路？〉，《胡適文存》第四集，卷四。
- ⑨ 胡適：〈答梁漱溟先生〉，《胡適文存》第四集，卷四。
- ⑩ 嚴復：〈與〈外交報〉主人書〉，《嚴復集》（三），頁561。
- ⑪ 胡適：〈愛國運動與求學〉，《胡適文存》第三集，卷八。
- ⑫ 嚴復：〈原強續篇〉，《嚴復集》（一），頁39-40。
- ⑬ 格里德：《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頁310。

章 清 1964年生於四川，現任復旦大學歷史系講師，從事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的教學研究工作。曾發表《亭子間：一群文化人和他們的事業》、〈實用主義哲學與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等論著。